

史學叢譯 張玉法主譯

現代中國史

合譯者

林滿紅 朱浚源

宋淑章 林貞惠 唐遠華

經世書局印行

譯主法玉張 叢譯學史

史國中代現

者 譯 合

源 涵 朱 紅 滿 林

華 遠 唐 惠 貞 林 章 淑 宋

行 印 局 書 世 經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三版

現代中國史

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圓整

主譯者：張玉法

發行人：馬之驊

出版者：經世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99號世界大樓1108室

電話：三一二二八九八號

郵撥：臺北六八九四號

印刷者：華信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板橋市中山路二段531巷46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玖叁貳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近年政府機構和各書局出版有關現代中國史的教科書很多，雖然內容不一，史實詳略互異，但在解釋上大都相同，這代表國內研究現代中國史的風氣。這些年來，外國也有一些類似於教科書的現代中國史出版，不僅內容不一，史實詳略互異，而且在解釋上彼此也多有不同，這代表國外研究現代中國史的風氣。除對現代中國史有深研的學者以外，就一般讀者而論，中國人對現代中國史的了解如此，外國人或在外國的中國人對現代中國史的了解如彼。中國近百年來講求「上下通，中外通」，近年全國上下真假各類溝通，以造成社會和諧，使國家能進一步躋身於現代國家之林。如果在史學上能加強中外溝通，必可使我國史學在世界史學中爭取重要地位。

史學需要中外溝通，是因為中外學者以不同的角度觀察史事。就現代中國史而論，外國一些學者視國內學者的著述為政治宣傳，國內部分學者視外國學者的著述為荒謬不經。如是，以目前我國千餘萬人的視聽，以抗世界數十億人的視聽，雖然大氣磅礴，猶覺力有未逮；不若彼此先解除藩籬，交換彼此觀點，然後從學術上爭論辯駁，以求真理自明。如是，不僅現代中國史學能脫離舊巢穴，向無窮的學術領域推廣，而且能加速中國史學發展，作為學術獨立的一個起步。多年來許多人去外國學習中國史，成為世界知名的史學家，國內卻未造就多少世界知名的史學家，這就是學術不獨立的表徵。

基於這一點構想，幾年前就想從翻譯一部英語世界流傳較廣的現代中國史做起，但因本身研究工作繁重，迄無暇動筆。去年經世書局發行人馬之驢表示希望出版一些史學上的翻譯書籍，題名「史學譯叢」，要我請人翻譯。爲了倡導起見，決定先出一部「現代中國史」譯本，作爲投石問路之計。但何書值得完全翻譯，或出版後不至過於驚世駭俗，頗費斟酌。因決定就流傳較廣的幾本教科書中，依照史事先後，各選取兩三章，編譯爲一冊。這可使讀者了解外人所著現代中國史的大概，且可不囿於一說。

被選譯的教科書有四種，一是克拉博（O. Edmund Clubb）的「二十世紀中國」（*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1964.），二是希諾（Jean Chesneaux），巴畢爾（Francoise Le Barbier），布爾吉（Marie-Claire Bergere）合著的「中國——從辛亥革命到中共佔據大陸」（*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 New York, 1977.），三是徐中約（Immanuel C. Y. Hsu）的「現代中國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1970.），四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克萊格（Albert M. Craig）合著的「東亞——現代的變遷」（*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and Tokyo, 1968, Third Printing）。本書第一、五章由第四書譯出，第二、三、四章由第二書譯出，第六、七章由第一書譯出，第八、九章由第三書譯出。第一、二章由宋淑章小姐翻譯，第三、四章由唐遠華小姐翻譯，第五章由林貞惠小姐翻譯，第六、七章由林滿紅小姐翻譯，第八、九章由朱沅源先生翻譯。章節及內文標題，儘量照原書譯出，惟因各書體例不同，其章節及內文標題闕如或

意義不明顯者，由編者補入或稍加改動。

被選譯的這些書，都藏於國內各大學圖書館，一般大學生，至少歷史系的學生，應該都知道或讀過的，但仍有翻譯的價值：①不一定每所大學都藏有這些書，②不一定每個想讀的人都能借到這些書，③不一定每個想讀的人都沒有閱讀上的困難。經過選擇彙譯成書之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人手一冊，隨時查閱，以與其他教科書相對照，俾能發現問題，進一步研究。

由於時勢所需，國內研究現代中國史的廣度與深度已漸增加。我不認為國內一般現代中國史教科書的論述都是說教式的，我也不認為國外一般現代中國史教科書論述都是荒謬的，是否客觀公正，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聞政府正囑有關機構開放史料，加強研究，希望國內的現代中國史研究，不久就可以進入學術的新境界。

張玉法

於中央研究院

現代中國史

目錄

序	一
第一章 改革與革命（宋淑章譯）	一
第一節 清末的改革	一
第二節 辛亥革命	二六
第二章 從共和到獨裁（宋淑章譯）	四一
第一節 共和政治的開始	四一
第二節 袁世凱走向獨裁	四一
第三章 軍閥時代（唐遠華譯）	五〇
第一節 中央政權與外國勢力	六一
第二節 地方政治與南北對立	六一
第三節 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七七

第四節	知識份子激烈主義的興起	八三
第四章	五四運動及其影響（唐遠華譯）	八九
第一節	五四與其重要性	八九
第二節	中央政府危機的擴大	九七
第三節	來自分裂勢力的壓力	一〇三
第五章	中國國民黨的興起（林貞惠譯）	一一一
第一節	國民革命的背景	一一一
第二節	中國國民黨的得勢	一二一
第三節	南京政府的黃金十年	一三〇
第六章	內憂與外患（林滿紅譯）	一四七
第一節	日本侵略東北	一四七
第二節	中國自身的分裂	一五六
第七章	中國民族主義的再起（林滿紅譯）	一六九
第一節	中共的武裝暴動路線	一六九
第二節	剿共戰爭的延續	一七八
第三節	西安事變的因果	一八七

第四節	中日衝突與國共聯合	一九五
第八章	中日戰爭（朱汝源譯）	二〇三
第一節	日本軍國主義的得勢	二〇三
第二節	一個未經宣佈的戰爭	二〇九
第三節	汪精衛的和平運動	二一五
第四節	國民政府的抗戰建國綱領	二一八
第五節	統一戰線及其沒落	二一九
第六節	戰時外交與美國的介入	二二三
第七節	戰爭的影響	二三六
第九章	內戰（一九四五—四九）（朱汝源譯）	二四一
第一節	受降問題引發衝突	二四一
第二節	毛澤東在重慶	二四三
第三節	蘇俄在東北	二四五
第四節	馬歇爾在中國	二四七
第五節	內戰的擴大	二五四
第六節	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二五八

第七節

國民政府失敗的原因

第一章 改革與革命

第一節 清末的改革

清朝最後十年（一九〇一—一九一〇），與其說是一個逐漸走向衰敗瓦解的時代，不如說是一個改革變遷的時代。因為政治制度與社會的改變，早已開始，而政治風暴僅僅到最後才爆發。事實上，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清廷爲了防止內部的分裂，已經開始重拾百日維新的故法，循著政法制度的改革，開始一連串重建的工作。而曾經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百日維新時推翻光緒皇帝與康有爲改革勢力的慈禧太后與其周圍的保守分子，也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後，開始著手實行大部份百日維新內想做而未做到的激烈改革計劃。事實上，他們確已無選擇的餘地，義和團的失敗已顯示出純排外主義的失敗，再加上反清革命的威脅，驅使清廷不得不採取積極態度以自救。因此當革命運動在中國外緣滋長時，保守的改革運動爲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最主要的運動。至於革命運動方面，革命主要領袖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自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廣州起義後，一直從事反清革命，但是直至一九〇五年，革命主義仍是片斷散漫的。所以在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以前，革命早期歷史僅是變流中的小旋渦而已。

爲革命打下基礎的不是革命份子，而是那些改革者，因爲清廷試圖引導的一連串變革，最後導致中

國人生活形態之改變與清廷本身的改變，這些並不能阻止將來傾覆清廷的反清勢力與離心勢力的增長。清廷派出出國留學的學生、在本國接受訓練的新軍、民族企業鼓舞下產生的商人、各省設立的諮議局，最後都轉向而變為反清勢力，成為傾覆清廷的主力。因此清廷就好像處在政治流沙中，愈是掙扎自救，陷得愈深。就中國民族主義的現代化而言——其意義或指滿人統治之結束——現代化就是沿海與長江流域各省興起的地方力量預示清廷中央權力的前途悲觀。

在這條走向政治死亡的道路上，清廷的改革努力不僅是機會主義者。在革命運動壓力下所施的一點反應，雖然其過程確是相當遲緩微弱，沒有效力，而且從沒有一個重大軍事壓力催促其進行，但是如果解決中國現代化特有的問題而言，滿清在他們權力運用下所施的各種改革是很值得的。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后在西安下詔罪己，並且下詔變法，採「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的政策，以表其變法的決心。而主持變法的中心人物之一榮祿也由張西方的語言與機器只是「西方科技文明之皮毛……而不是西洋文明之根本」。在變法聲中，曾經在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亂期間一面倡東南互保運動與外人和平相處，一面又忠於清廷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他們的變法主張，為此後清廷變法之張本。

張之洞、劉坤一的變法主張全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人會銜上奏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摺（簡稱三摺）中，其中所列舉的變法要端，均未超過百日維新的範圍，只是藉口自強的口號——即西學是源於古代中國，再傳至今的，「現在要行的變法都是在藉外國文化恢復已被我們忘却的古聖先賢的哲理」，

而不忽視我們固有文化——巧妙地把變法施之於復古，轉變變法之意義。然而張之洞在三摺中也坦白的說：「……不知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兵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釐局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亂民漸起，邪說乘之。」因此，自此以後，清廷即急於變法，其新政包括設立新式學校制度、派遣留學生出洋留學、仿西法訓練新軍、獎勵與發展工商業、修訂法律與稅則、裁汰閒官與胥吏等等。須要改革的事端實比以前多，但是爲了替政府培植人才，教育問題仍爲一切改革之首。

教育、新式學堂與新知識份子 清末教育改革的一般目標，乃在求有效地訓練與選擇政府人才，其最初的目的，不是在爲一般民衆提倡公共教育（不過這爲以後教育改革的理想），也不是在提倡個人的教育自由。也就是說政府在地方所設的各級學校——鄉、縣、省、京都各級——與科舉考試制度同爲國家掄才的制度，且更加強科舉的功能。因此當新式學校在公共資助下興起後，能在短短十年後，取代傳統考試制度的功能，並促使科舉制度的廢止。但是在當時，應社會之希望，新式學堂與科舉考試制度仍同時並行，願意進入新式學校預修者和志願以傳統方式求取功名者，同樣可以參加正式考試。當然，考試在內容方面，已經相當的現代化了。一九〇一年八月，已被學者攻擊了好幾世紀的八股文終被廢除，且於同年九月，舊式書院全部改爲公立學校。

爲了要使新式學校制度被社會接受，視之爲走向進步的主要方法，首先必須要緩和當時在傳統科舉制度上有其既得利益的官紳，與一直渴望借科考追求功名的傳統士大夫之反對。爲了安撫籠絡這些保守

知識份子，新式學校的各級學生，均可參加各級的科考，只是從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起，科舉考試的主題同時包括了現代與古典的科目。但是這種新舊並存，同爲入官之階的妥協辦法，很快地顯示出傳統的自行準備科考之路線，要比入新式學堂再參加科考的方式省錢、容易、更具有吸引力，因爲入新式學堂要花相當大的費用與時間，學習一些佔了很大比例的規定課程。因此大部份舊式知識份子都不願進入新式學堂。至於一些少數難以駕御的現代青年（亦即未來的領導階層），他們必須進入政府新式學堂，始可能有較好的出路，除非他根本與清廷對立，不屑於清朝之官祿。不過，其他如在中國的教會學校，新留日風潮，和社會對各種現代教育之需求，在在都破壞科舉制度的獨佔性。

新式公立學校首先面臨的競爭對象，便是設於重要城市中心的基督教教會學校。據統計，到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時，新教教士在中國已設有二二〇〇所幼稚園和小學，共有四二、〇〇〇名學童，三八九所中級、高級學校與大學，共有學生一五、〇〇〇位。上海聖約翰大學就是日漸成長的基督教大學之一，其前身爲一所聖公會男子學校（一八四七年建），後於一八七九年由新教監督希瑞喬斯克（S. J. Schereschewsky）改建而成，這所中外教職混合的學校中，有五位教授是來自在美國哈德佛受教育的中國首批留美學生。該校到一九〇四年，文學院、醫學院、工學院三學院中，共有學生一八七名，其中只有五十七名爲基督徒，其他大多數爲殷商及官員的子弟。

教會學校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在中國漸漸助長了基督教信仰、個人主義、婦女教育、及一般西方作風，且豎立了許多革命性的精神。它們絕對不讓它們的學生如一般公立學校所要求的那樣絕對忠於孔

子與清帝，所以清廷亦以禁止教會學校畢業生從事公務，作爲對抗之表示。

此時私立的現代教育也開始了。在一九〇四年從北洋海軍學堂畢業的青年張伯苓，在天津開創一所中學，學生僅七十三名。一九〇七年他取得一塊學校場地，而建立了南開中學與後來的南開大學（一九一九年建）。

因此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後，新式學堂與科舉制度的結合，似乎未能吸引那些執着於科舉的舊式知識份子，或那些湧進教會學校及私立學校的現代知識份子，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召集會議，經再三的討論，認爲新式教育在科舉制度未廢止前，學堂無展布之可能，不能達到教育之鵠的，也得不到社會經濟上的支援。故爲達到目的，其間必須作一抉擇，他建議清廷按年遞減科舉取士之數，以學校教育代其功能。他認爲學校課程應「凡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文學、理學無不包舉靡遺，凡科舉之所講習者學堂無不優爲。」並且爲了提高學生素質，凡各級學校畢業學生均須通過簡放主考會同督撫學政的考試。一九〇四年一月朝廷下詔，決定漸減舊式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希望因此使青年放棄科舉轉向新式教育。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朝在日本戰勝俄帝與反清革命組織在東京重組之刺激下，在地方督撫張之洞、袁世凱之領導下，希望能急速改革。一九〇五年八月清廷立即下令廢除科舉制度，從一九〇六年正式停止。由於科考之廢止，清廷把所有教育希望寄託於新式學校。一九〇六年學部成立，以監督新式教育之進行。

清政府的學校制度是採取日本式的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後即行專業化教育，以培養專業人才爲政府服務。這種教育制度在傳統科舉制度未廢止以前便已漸開始與科舉制度交錯實施，直到一九〇五年始得完全實行。實施之大綱與細節規定在一九〇四年公佈，其內容多模仿日本的教育實例，規定高小四年，中學五年，高中三年（可得相當於舉人出身），京師大學三年（即可得相當於進士出身），全部課程亦有明確規定。

因此晚清教育改革者，不僅僅消極地廢止傳統科舉制度，並且更積極地要建立一套現代學校制度，這項改革如清廷其他改革一樣，從百日維新建立京師大學堂開始，曾於一八六九—一八九五年爲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人丁韋良（W. A. P. Martin）便是京師大學堂首任西學總教習。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京師大學堂合併了同文館，漸發展成以後的國立北京大學（縮寫爲北大），但是除了這所最高學府外，其下的各級新式學校組織，則普遍缺乏現代訓練的教師、建築、設備、資金、及領導人才。

如同工業化方面一樣，建立學校組織之過程，主要的成功仍是在地方各階層的實施與改革，例如在教育改革方面居領導地位的張之洞，在湖北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學校——其中包括一所師範學校、五所高等小學、幾所文武中等和高等學校，以及外語、農業、工業專校與在職文官的訓練學校等——其他各省亦隨之跟進，興建學校，但是由於大學比中學容易成立，中學又比小學易建，所以學校體系中，基礎教育仍是相當薄弱。

地方教育改革者的主要改革方略都是從日本教育制度中吸取來的，張之洞就曾派遣兩個教育考察團

赴日本考察日本的學校制度，購買教科書，並且延請日本學者和教授至中國，藉著文字與中國學者、學生溝通。此外張氏亦開始了解社會公衆教育對發掘人才的重要，且相信日本將是訓練新生一代的中國教師最好的地方——因為日本路近、費省、時短、便於考察，日文近於中文，易於通曉，且日人已得西學之精髓而無西學之弊。

中國青年留學日本求取現代教育之風氣在一八九六年即已開始，據統計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留日學生僅有十八名左右，但是在同年百日維新失敗後，留日學生在一八九九年便增至二百餘人，而且在一九〇一年後人數不斷增加，至一九〇三年已達一〇〇〇名左右，一九〇四年約一三〇〇人，一九〇五年末科舉考試廢除後人數大量增加，已達八千人左右，一九〇六年更多的青年學生去日本，人數約在一萬三千人以上。但是去日本的人數雖多，註冊入學求知的留學生僅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最後能够畢業的人數更爲稀少。而從較有名望的日本學校畢業者則是微乎其微，每年從未超過七〇〇人（一九〇八年有六二三名，一九〇九年五三六名，一九一〇年六八二名，一九一一年達到最高峯有六九一名）。雖然如此，但是在當時這個數字也是相當可觀了。

清末最後十年數以萬計的留日青年，有一半是靠公費留學，而且這些公費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學生在留學之前，通常先在地方新式學校準備，然後再隨每年赴日的代表團至東京。在日本，留學生循著傳統中國地方結社的習慣，由政府官員、士紳或北京及其他歷史悠久的城市商人，出面組織各種同鄉會。因此從這方面來看，新教育制度使青年男子甚至一些年青女士緊緊地結合起來，經過一段較長的